

# 农民工回流能改善其父母的生活质量吗？\*

李 放 赵晶晶

**摘要：**农民工回流客观上拉近了子女与父母的居住距离，势必会对原因为子女外出务工导致的农村养老难、农村留守老人等问题产生影响。本文基于安徽、河南、四川3省的实地调研数据，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OLS估计以及有序Probit模型，分别从经济状况、心理状况、生活满意度3个方面检验了农民工回流对其父母生活质量的影响。结果显示，在总体上，农民工回流显著改善了其父母的心理状况和生活满意度，但对父母的经济状况无明显影响；回流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情感慰藉则对父母的生活质量有着不同程度的改善作用。

**关键词：**农民工回流 父母 经济状况 心理状况 生活满意度

**中图分类号：**C913.7 **文献标识码：**A

## 一、引言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每年有数以亿计的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务工，但受城乡二元结构和户籍制度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农村劳动力在向城镇转移的过程中始终存在着返乡或回流的现象。有研究显示，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21世纪初期，中国农民工返乡率在22%~38%之间（Zhao, 2002; Wang and Fan, 2006; Demurger and Xu, 2011）。近年来，伴随着中国经济的转型以及新常态下经济增速的换挡回落，外出农民工增速下降，回流到本地就业的农民工占比逐步提高。2011~2016年，外出农民工总量增速分别为3.4%、3%、1.7%、1.3%、0.4%和0.33%，呈逐年回落趋势<sup>①</sup>。2015年，本地农民工占农民工总量的39.2%，较上年提高0.6个百分点<sup>②</sup>；2016年，本地农民工占农民工总量的39.9%，较上年提高0.7个百分点，本地农民工增量占新增农民工总量的比例达到88.2%<sup>③</sup>。众所周知，农村大量青壮年劳动力流出到城市务工是导致农村养老难、农村留守老人等问题的直接原因，那么，在外出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农民工回流视角下的农村养老保障研究”（编号：16AGL013）的研究成果之一。本文研究同时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农民获得更多土地财产权益的体制机制创新研究”（编号：17ZDA076）的资助。感谢匿名审稿专家、两刊首届“三农论坛”工作坊专家以及编辑部的宝贵意见。作者文责自负。

<sup>①</sup>参见国家统计局：《2016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704/t20170428\\_1489334.html](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704/t20170428_1489334.html)。

<sup>②</sup>参见国家统计局：《2015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604/t20160428\\_1349713.html](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604/t20160428_1349713.html)。

<sup>③</sup>参见国家统计局：《2016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704/t20170428\\_1489334.html](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704/t20170428_1489334.html)。

农民工总量增速放缓、回流到本地就业的农民工数量逐步增加的新形势下，农村养老难的问题是否得以缓解、农村老人的生活质量是否有所改善成为值得关注的研究课题。

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带来的农村养老问题是多年来相关理论和实际工作者关注的焦点，一些文献综合分析了农民工流出对农村养老的影响。例如，He and Ye (2014) 认为，随着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规模外流，家庭不再是老人获得养老支持的可靠来源，老人的福利水平被逐渐削弱。罗芳、彭代彦(2007) 则认为，子女外出务工对家庭养老的利弊难以衡量。子女外出务工后，一方面增加了对父母的经济支持，为其生活带来正面影响；另一方面减少了对父母日常的生活照料和情感慰藉，为其生活带来负面影响。更多的文献从经济状况、健康状况、生活满意度等方面具体分析了农民工流出对父母生活质量的影响。在子女的经济供养方面，有研究发现，子女外出务工会导致传统的供养资源出现货币化趋势，即会向父母提供更多的金钱回报 (Cong and Silverstein, 2011)，从而增强了对父母的经济供养能力。卢海阳、钱文荣(2014) 基于 15 个省份的 978 个有效样本分析了子女外出务工对父母生活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成年子女外出务工会明显提高父母的物质生活水平。然而，也有研究发现，子女外出务工只能在较小幅度上增加对父母的经济支持力度，少数子女还会降低对父母的经济支持力度，甚至会让父母帮忙监护孙辈，从而导致代际经济支持出现逆向流动，间接加重了父母的经济负担 (叶敬忠、贺聪志, 2009)。在父母的身体健康方面，连玉君等(2015) 基于 CHNS 2006 年和 2009 年的横截面数据，通过建立计量经济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子女外出务工对父母的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都会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舒玢玢、同钰莹(2017) 进一步研究指出，子女外出务工不利于父母的健康，长期的聚少离多、生活照顾和情感慰藉的减少是导致父母健康状况变差的主要原因。外出务工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不会改善父母的健康状况，情感慰藉才能够促进老人的身心健康 (宋月萍, 2014)。Xiang et al. (2016) 运用中国的调查数据研究发现，成年子女外出务工会使父母身体状况不佳的概率增加 8% 左右，尤其是那些只有一个孩子、来自低收入家庭的老人受到的影响更大。然而，也有研究表明，成年子女外出务工虽然不利于父母的心理健康，但并不会影响父母的身体健康 (Adhikari et al., 2011)。在生活满意度方面，有研究表明，子女外出务工会使父母的生活满意度大大下降 (连玉君等, 2015)。另外，家庭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的时间长短、外出务工的地域范围都能够显著影响老人的生活满意度 (唐浩、施光荣, 2014)。

虽然农村劳动力向外流动是主流，但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几次农民工回流潮仍逐渐受到关注。部分学者从宏观层面分析了农民工规模性回流的原因，认为金融危机、东南沿海地区产业结构调整以及中部地区承接产业梯度转移促使了回流农民工比例的增加 (白南生、何宇鹏, 2002; 王春超等, 2009)。同时，国家惠农政策的密集出台也是农民工回乡继续从事农业生产或者返乡创业的原因 (谭崇梅等, 2009)。更多的学者从个人因素、家庭因素和制度因素等方面分析了农民工的回流意愿和回流决策。有研究发现，农民工人力资本越高，越倾向于在城市生活，而越不愿返回农村老家 (李强、龙文进, 2009; Junge et al., 2015)。胡枫、史宇鹏(2013) 认为，农民工的回流决策既受到其人力资本的影响，也受到需要回乡赡养老人、与家人团聚等家庭因素的影响。张丽琼等(2016) 则基于实际调研数据进一步实证验证了家庭因素会显著影响中国农民工的返乡意愿。赵亮等(2009) 的研究表明，农民工的年龄、

流动距离对其回流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务工时间、务工收入和受教育程度则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此外，社会保障因素能够显著影响农民工的回流意愿，农民工若参加城镇失业保险、城镇医疗保险或者城镇养老保险，其回流意愿较弱（余运江等，2014）。当前，随着农民工返乡创业热潮的兴起，学者们的关注点越来越多地聚焦于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影响因素与创业绩效上，较普遍地认为，相较于经济收益、地位获得而言，家庭因素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影响更为突出（朱红根、解春艳，2012），而农民工返乡创业的企业绩效则显著地受到其社会资本、企业家能力和服务环境的影响（陈文超等，2014）。

综上所述，关于农民工流动与农村养老问题，大量文献关注的是农民工流出对农村养老的影响，对农民工回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回流的影响因素、返乡就业创业的影响因素与创业绩效等问题上，几乎没有涉及农民工回流对农村养老的影响。然而，考察农民工回流对农村养老的影响不仅有利于发现农村养老问题的症结所在，还可以为政府制定农村养老的相关政策提供实证依据和重要参考。本文基于实地调研数据，尝试回答以下两个问题：第一，农民工回流后其父母的生活质量总体上是否得到了改善？第二，子女回流前后代际支持有哪些方面的变化、对其父母的生活质量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本文余下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理论分析、研究方法与模型设定；第三部分为数据来源及描述性统计分析；第四部分为实证结果与分析；最后总结全文并讨论政策含义。

## 二、理论分析、研究方法与模型设定

### （一）理论分析

“生活质量（quality of life）”一词最早是由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J. K. Galbraith）于1958年在《富裕社会》一书中提出的，是一个复杂、多维度的概念（李建新等，2014）。至今，学者们对生活质量的界定尚未达成共识。国外学者认为，老年生活质量包括社会经济地位、健康水平、生活满意度、自我尊重4个方面（George and Bearon，1980）；国内学者指出，生活质量的内容应该包括客观与主观两部分，因此，对老年人生活质量的评价，既要考虑客观的生活质量，也要考虑主观的心理感受（郭沧萍，1990）。国内大多数学者采用中华医学会发布的《老年人口生活质量调查表》中的健康状况、日常生活功能、经济收入、心理卫生、生活满意度等11个方面的指标来评价老年人生活质量（于普林，1996）。本文基于实际研究需要，参照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从经济状况、心理状况和生活满意度3个方面考察老人的生活质量。

中国以家庭为依托的基本养老模式决定了大多数父母的生活质量与子女的代际支持高度相关。相关研究表明，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和情感慰藉都能够显著降低农村空巢老人患抑郁症的概率、提高他们的生活满意度，而且情感慰藉的作用更加明显（郑晓冬、方向明，2016）。一般情况下，父母从子女处获得的代际支持主要包括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情感慰藉。其中，经济支持主要是指给予父母一定的金钱用于日常消费；而生活照料则是对父母的日常生活提供帮助，尤其是当父母由于年老或生病出现行动障碍时；情感慰藉则主要体现在定期的看望、问候以及与父母的沟通交流上。很多农村留守老人是孤独并且与社会隔绝的，代际情感沟通有助于减少他们的孤独感，分担或排解他们的负面情绪。

吉登斯关于行动空间的共同在场认为，人们的行动和关系是存在于空间中的，只有同时处在同一物理空间之中，才能形成彼此之间的关系，继而才能够进行日常交往（安东尼·吉登斯，1998）。子女外流会导致父母在居住和生活方式上出现独居化、空巢化、隔代化的特征，从而使父母面临着物质层面的赡养不足、日常生活照料和疾病照料的缺失以及精神层面的孤独与寂寞，其生活质量令人担忧（贺聪志、叶敬忠，2010；左冬梅、李树茁，2011）。相对而言，子女回流会改变代际居住安排及空间距离，即意味着代际共同居住或居住距离明显拉近。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两方面：首先，在经济方面，子女回流后可能会与父母共同吃住，从而可以帮助解决他们的日常生活开支；即便不与父母共同居住，当父母经济窘迫时获得子女相应的经济支持也有空间距离上的便利（狄金华等，2014）。其次，在身心健康方面，代际居住距离的拉近便于子女对父母提供日常生活照料和疾病照料，同时，彼此之间沟通交流的增加对父母的身心健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 （二）研究方法 with 模型设定

1. 倾向得分匹配法。子女是否回流是一种自我选择行为，并不是随机产生的，倘若对这种自选择行为不进行有效处理，可能会导致本文无法正确地得出子女回流对父母生活质量的影响。针对此，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PSM）来尽量消除模型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以期得到无偏的估计结果。PSM 在计算过程中包括三种平均处理效应，即处理组平均处理效应（ATT）、平均处理效应（ATE）和控制组平均处理效应（ATU）。通常情况下，学者们关注的是 ATT，对本文来说即有回流子女组中的个体由于子女回流所导致的生活质量变化。

通过 PSM 计算平均处理效应的一般步骤如下：首先，借鉴 Rosenbaum and Rubin（1983）提出的反事实分析框架，将样本分为处理组（有回流子女组）和控制组（无回流子女组），那么，有回流子女组的平均处理效应（ATT）可定义为：

$$ATT = E \left\{ E \left[ Y_{1i} \mid D_i = 1, p(X_i) \right] - E \left[ Y_{0i} \mid D_i = 0, p(X_i) \right] \right\} \quad (1)$$

（1）式中， $Y_{1i}$  表示处理组结果，即有回流子女老人的生活质量， $Y_{0i}$  表示控制组结果，即无回流子女老人的生活质量； $D_i=1$  表示有回流子女， $D_i=0$  表示无回流子女。 $p(X_i)$  是倾向得分，表示老人有回流子女的概率，采用 Logit 模型进行估计。

然后，根据倾向得分值的大小对样本进行匹配处理，根据匹配后的样本来计算 ATT，以此来判断是否有回流子女对父母生活质量的影响。为了检验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首先采用最近邻方法进行匹配，之后再分别采用半径匹配和核匹配方法进行匹配。

2. 普通有序 Probit 模型。本文通过 3 个被解释变量来反映老人的生活质量，但除了经济状况为连续变量，可以采用 OLS 进行回归分析以外，反映心理状况和生活满意度的变量值均为排序数据（ordered data）。对于这两个变量，如果采用 multinomial Probit 模型进行估计，将会无视数据内在的排序；如果采用 OLS 进行回归，又会将内在的排序视为基数来处理。因此，本文采用有序 Probit（ordered Probit）模型进行估计。模型设定如下：

$$y_i = F(\beta child_i + \gamma X_i + \varepsilon_i) \quad (2)$$

(2) 式中,  $i$  表示个体;  $y_i$  为被解释变量, 测度父母的心理状况或生活满意度;  $child_i$  为主要解释变量, 测度子女回流前后对父母提供的经济支持变化、生活照料变化和情感慰藉变化;  $X_i$  为控制变量, 包括个体特征、家庭特征以及地区特征变量;  $\varepsilon_i$  为随机误差项。函数  $F(\cdot)$  为某非线性函数, 具体形式为:

$$F(y_i) = \begin{cases} 1, & y_i^* \leq r_1 \\ 2, & r_1 < y_i^* \leq r_2 \\ \dots & \dots \\ J, & r_{J-1} \leq y_i^* \end{cases} \quad (3)$$

(3) 式中,  $y_i^*$  是  $y_i$  背后存在的不可观测连续变量, 称为潜在变量;  $r_1 < r_2 < \dots < r_{J-1}$  为待估参数, 称为切点 (cutoff points)。

### 三、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分析

#### (一) 数据来源与变量选择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农民工回流视角下的农村养老保障研究”课题组于 2016 年 10 月~2017 年 8 月开展的实地调查。调查区域覆盖安徽省、河南省和四川省。这 3 个省均是劳务输出大省, 也是农民工回流规模较大的省份。课题组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方法, 首先在每个省随机抽取 5 个地级市, 然后在每个地级市随机抽取 80 名 60 周岁及以上农村老人为调查对象。问卷中, 将回流农民工定义为“曾经在户籍地 (县级市) 以外务工 6 个月以上, 2007 年以后 (含 2007 年) 返回户籍所在的县、乡镇或村 1 年以上, 且未再外出的农村居民”。之所以将农民工返乡的时间界定为 2007 年以后, 一是为了保证数据的准确性和时效性, 二是考虑到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和蔓延引发了农民工较大规模返乡。调查问卷的具体内容包括个人基本情况、家庭情况 (婚姻状况、居住状况、子女个数等) 以及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与生活照料等方面情况。该调查共收集问卷 1180 份, 剔除某些关键信息缺失和极值的样本后, 最终用于分析的有效样本共 1061 个。

本文的主要变量定义如下: 被解释变量包括 3 个变量, 即父母的经济状况、心理状况、生活满意度。其中, 经济状况根据调查问卷中对“2016 年您 (和老伴) 的总收入?”这一问题的回答来定义, 对其取对数后放入回归方程; 心理状况根据问题“您是否经常感觉到孤独寂寞?”来定义, 0~4 分别对应“总是”“经常”“一般”“偶尔”和“从不”; 生活满意度根据问题“您对目前生活状况的满意程度?”来定义, 0~4 分别对应“非常不满意”“比较不满意”“一般”“比较满意”和“非常满意”。

在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分析子女回流对父母生活质量的总体影响时, 基于研究目的及参照已有的

相关文献，选用父母的个人特征<sup>①</sup>变量（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等）、家庭特征变量（子女个数、居住安排等）以及地区特征变量来估计老人是否有回流子女的倾向得分。

在采用 OLS、有序 Probit 模型估计子女回流前后代际支持的变化对父母生活质量的影响时，主要解释变量为子女回流前后提供的经济支持变化、生活照料变化和情感慰藉变化。其中，对经济支持变化、生活照料变化的测度分别基于问卷中“与回流前相比，子女回流后对您（和老伴）经济支持的变化？”“与回流前相比，子女回流后对您（和老伴）生活照顾的变化？”这两个问题。每个问题下设有“减少很多”“减少一点”“没有变化”“增加一点”和“增加很多”5个选项。由于选择“减少很多”“减少一点”的样本量很少，为获得稳健的估计结果，在拟合模型时，将“减少很多”“减少一点”进行合并，将“增加一点”“增加很多”进行合并，即答案选项合并后变为“有所减少”“没有变化”和“有所增加”，并依次赋值为“0”“1”和“2”。对情感慰藉变化的测度则基于问卷中“与回流前相比，子女回流后您感觉与子女情感关系的变化？”问题，答案设有“变得非常疏远”“变得比较疏远”“没有变化”“变得比较亲密”“变得非常亲密”5个选项。类似地，将“变得非常疏远”“变得比较疏远”进行合并，将“变得比较亲密”和“变得非常亲密”进行合并，答案选项合并后变为“变得疏远”“没有变化”和“变得亲密”，同样依次赋值为“0”“1”和“2”。控制变量同样包括父母的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和地区特征变量。

变量的含义和赋值见表 1。

表 1 变量的含义和赋值

变量名称	变量含义和赋值
经济状况	“2016 年您（和老伴）的总收入（元）？”
心理状况	“您是否经常感到孤独寂寞？”总是=0，经常=1，一般=2，偶尔=3，从不=4
生活满意度	“您对目前生活状况的满意程度？”非常不满意=0，比较不满意=1，一般=2，比较满意=3，非常满意=4
是否有回流子女	否=0，是=1
经济支持	“与回流前相比，子女回流后对您（和老伴）经济支持的变化？”有所减少=0，没有变化=1，有所增加=2
生活照料	“与回流前相比，子女回流后对您（和老伴）生活照顾的变化？”有所减少=0，没有变化=1，有所增加=2
情感慰藉	“与回流前相比，子女回流后您感觉与子女情感关系的变化？”变得疏远=0，没有变化=1，变得亲密=2
性别	女=0，男=1
年龄	2017 年时的年龄（岁）
婚姻状况	无配偶=0，有配偶=1
是否患有慢性疾病	否=0，是=1

<sup>①</sup>受访者可能是回流农民工的父亲，也可能是其母亲，因此，本文讲到的“父母的个人特征”均指的是受访者的个人特征。

(续表 1)

生活自理状况	日常生活完全不能自理=0, 日常生活部分不能自理=1, 日常生活完全能够自理=2
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0, 初中及以上=1
是否从事非农工作	否=0, 是=1
子女个数	子女个数(个)
居住安排	是否独居(或与老伴居住); 否=0, 是=1
子女是否每年给赡养费	否=0, 是=1
安徽省	否=0, 是=1
河南省	否=0, 是=1
四川省	否=0, 是=1

(二) 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 2 显示了相关变量的基本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表 2 的第 1 列给出了总体样本的变量均值及标准差, 后面两列分别给出了有回流子女组样本与无回流子女组样本的变量均值及标准差。从表 2 可以发现, 有无回流子女两组样本之间各变量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总体样本的年总收入平均为 10521.70 元, 但分组来看, 有回流子女的父母年总收入均值为 9594.37 元, 低于无回流子女父母的 11897.23 元, 差异在 1% 的置信水平上显著。总体样本中, 反映心理状况变量的均值为 2.96, 说明父母的心理状况总体高于中等水平, 即并不经常感觉到孤独寂寞; 反映生活满意度变量的均值为 2.58, 表明总体来看, 父母对生活的满意程度介于“一般”与“比较满意”之间。有回流子女父母的生活满意度变量的均值为 2.65, 远高于无回流子女父母的 2.49, 并且差异在 1% 的置信水平上显著。总体样本中有回流子女的父母比例为 59.07%, 略高于无回流子女的父母比例。

表 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全部样本		有回流子女		无回流子女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经济状况	10521.70	8506.01	9594.37***	8278.12	11897.23	8671.08
心理状况	2.96	1.19	2.98	1.17	2.94	1.21
生活满意度	2.58	0.84	2.65***	0.85	2.49	0.84
是否有回流子女	0.59	0.49	—	—	—	—
经济支持	—	—	1.17	0.67	—	—
生活照料	—	—	1.73	0.48	—	—
情感慰藉	—	—	1.59	0.53	—	—
性别	0.55	0.50	0.47***	0.50	0.65	0.48
年龄	66.29	5.91	67.75***	6.45	64.18	4.21
婚姻状况	0.81	0.39	0.77***	0.42	0.88	0.32
是否患有慢性疾病	0.60	0.49	0.64***	0.48	0.55	0.50
生活自理状况	1.89	0.35	1.86***	0.38	1.93	0.30
受教育程度	0.23	0.42	0.19***	0.39	0.28	0.45

(续表 2)

是否从事非农工作	0.26	0.44	0.21***	0.41	0.33	0.47
子女个数	2.61	1.20	2.84***	1.22	2.29	1.08
居住安排	0.83	0.37	0.78***	0.41	0.91	0.29
子女是否每年给赡养费	0.57	0.50	0.62***	0.49	0.52	0.50
安徽省	0.26	0.44	0.28	0.45	0.24	0.43
河南省	0.34	0.47	0.36	0.48	0.31	0.47
四川省	0.38	0.49	0.36***	0.48	0.45	0.50

注：①\*\*\*、\*\*、\*分别表示变量在有回流子女组和无回流子女组之间差异的t检验结果在1%、5%、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②全部样本的观察值个数为1061，有回流子女组的观测值个数为625，无回流子女组的观测值个数为436。

从有回流子女的样本中，可以看到子女回流前后对父母所提供的代际支持的变化（见表2）。子女回流前后向父母提供经济支持变化的变量均值为1.17，表明父母感觉子女回流前后对其提供的经济支持变化不大；反映子女回流前后向父母提供生活照料变化的变量均值为1.73，表明父母感觉子女回流后得到的生活照料比回流前有所增加；反映子女回流前后提供精神慰藉变化的变量均值为1.59，表明父母感觉子女回流后与子女的关系比回流前更加密切。

从总体样本中父母的个体特征来看，男性占比为54.62%，略高于女性；父母的平均年龄为66.29岁；绝大多数父母有配偶（占81.06%）；60.49%的父母患有慢性疾病；反映父母日常生活自理状况变量的均值为1.89，表明绝大多数父母日常生活能够完全自理；受教育程度方面，仅有22.81%的父母接受过初中及以上教育，表明父母的文化程度较低；目前仍然从事非农工作的父母较少，仅占总样本的25.59%。从家庭特征来看，父母的子女个数平均为2.61人；独居或与老伴居住的老人占83.30%；57.43%的父母每年能够获得子女的赡养费。从样本的地区分布来看，总体上样本分布比较均匀，四川省的有效样本量相对较多。

为了更好地分析子女回流对父母生活质量的影响，图1刻画了有无回流子女两组不同样本中父母心理状况的差异。从图1可以看出，在回答“您是否经常感觉到孤独寂寞？”问题上，有回流子女的父母选择“总是”“经常”和“一般”选项的人数比例均低于无回流子女的父母，而选择“偶尔”“从不”选项的总人数比例高于无回流子女的父母。图2刻画了两组样本中父母生活满意度的差异。可以看出，有回流子女的父母在回答“您对目前生活状况的满意程度？”问题上选择“非常不满意”“比较不满意”和“一般”选项的总人数比例低于无回流子女的父母，而选择“比较满意”“非常满意”选项的人数比例均高于无回流子女的父母。结合上文对年总收入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可以发现，子女回流后，虽然父母的经济状况并未得到改善，但孤独感有所缓解，主观的生活满意度有所提高，因此可以初步判断，子女回流可能会改善父母的生活质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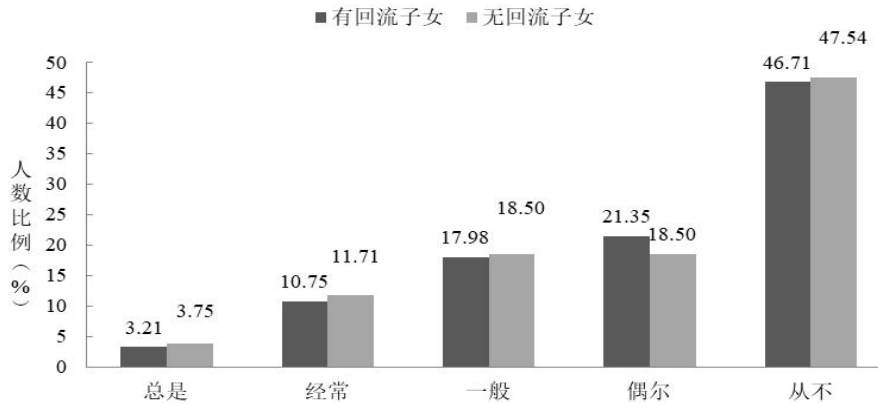


图1 有无回流子女父母心理状况的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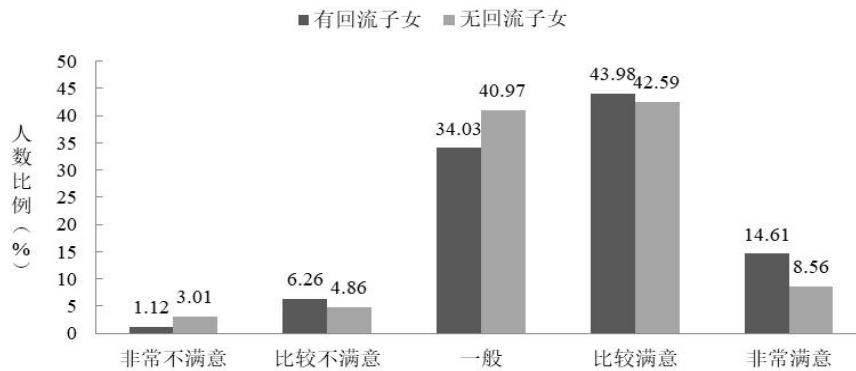


图2 有无回流子女父母生活满意度的差异

表3进一步分析了与回流前相比，子女回流后在总体上对父母提供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情感慰藉的变化情况。从表3可以看出，在经济支持方面，15.48%的父母感觉子女回流后对其提供的经济支持有所减少，52.42%的父母感觉没有变化，32.10%的父母感觉有所提高；在生活照料方面，仅有1.46%的父母感觉子女回流后得到的生活照料比子女回流前有所减少，24.15%的父母感觉没有变化，74.39%的父母感觉有所增加；在情感慰藉方面，只有2.10%的父母感觉子女回流后与子女的关系变得疏远了，37.16%的父母感觉没有变化，60.74%的父母感觉与子女的关系变得更加亲密了。总体来看，子女回流明显增加了对父母的日常生活照料，同时，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也变得更加亲密，但经济方面的支持变化相对不大。

表3 子女回流前后对父母代际支持的变化情况 (%)

	有所减少	没有变化	有所增加
经济支持	15.48	52.42	32.10
生活照料	1.46	24.15	74.39
	变得疏远	没有变化	变得亲密
情感慰藉	2.10	37.16	60.74

##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 （一）子女回流对父母生活质量的总体影响

1.倾向得分匹配估计结果分析。本文首先基于个人特征变量、家庭特征变量以及地区特征变量运用 Logit 模型来估计调查对象有回流子女的概率，得到倾向得分值，其次根据倾向得分值的大小采用最近邻匹配方法对样本进行匹配处理，进而测算出父母目前的经济状况、心理状况、生活满意度变量的 ATT，结果如表 4 所示。通过对比发现，三个变量匹配前后的 ATT 值及其显著性均存在一定的差异，表明 PSM 方法控制了由自选择行为带来的内生性问题，使得文中匹配后的结果更准确（刘亚洲等，2016）。ATT 的结果表明，子女回流后，父母的经济状况虽然出现了改善的趋势，但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可能的原因是，相较于回流前，子女回流后对父母提供的经济支持的变动幅度并不大，从而父母的经济状况未明显受益于子女回流。而子女回流后父母的心理状况和生活满意度均在 10% 的置信水平上得到了显著改善。

表 4 子女回流对父母生活质量的平均处理效应

变量名称	样本	有回流子女组	无回流子女组	ATT 值	标准误
经济状况	匹配前	8.796	9.069	-0.272***	0.056
	匹配后	8.860	8.836	0.024	0.076
心理状况	匹配前	2.975	2.957	0.019	0.075
	匹配后	3.005	2.825	0.180*	0.108
生活满意度	匹配前	2.647	2.498	0.149***	0.053
	匹配后	2.635	2.520	0.115*	0.068

注：①\*\*\*、\*\*和\*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水平上显著；②匹配后的标准误是采用 bootstrap 抽样得到的自助标准误，自助样本为 1000 个。

2.平衡性及稳健性检验。为了确保最近邻匹配方法的有效性，需要保证处理组和控制组的平衡性，即经过匹配后，有回流子女组和无回流子女组在各个控制变量上无显著差异。匹配结果显示，匹配后各个变量的标准偏误与匹配前相比都有不同程度的消减，最大下降比例达到 99.1%，最小也降低 36.9%，且大多数变量的标准偏误值都小于 10%，说明匹配后有回流子女组与无回流子女组的样本均值更加接近。并且，匹配后大多数变量的 t 检验值不能拒绝“有回流子女组和无回流子女组无系统差异”的原假设，说明最近邻匹配较好地消除了样本之间的选择性偏差<sup>①</sup>。

为了检验匹配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又分别采用半径匹配、核匹配方法重新对样本进行匹配分析，结果见表 5。从不同匹配方法下 ATT 的结果可以看出，无论是父母的经济状况、心理状况，还是生活满意度，采用半径匹配法和核匹配法得出的结果与采用最近邻匹配法得出的结果均大致相同，虽然数值上略有差异，但没有影响相关结论，即子女回流显著改善了父母的心理状况和对目前生活状况的满意程度，但对父母的经济状况尚未产生影响。

<sup>①</sup>由于篇幅原因，平衡性检验的详细结果没有列出。读者若有兴趣，可向本文作者索要。

表 5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样本	有回流子女组	无回流子女组	ATT 值	标准误
半径匹配					
经济状况	匹配前	8.796	9.069	-0.272***	0.056
	匹配后	8.860	8.854	0.006	0.064
心理状况	匹配前	2.975	2.957	0.019	0.075
	匹配后	3.005	2.846	0.159*	0.095
生活满意度	匹配前	2.647	2.498	0.149***	0.053
	匹配后	2.635	2.528	0.107*	0.057
核匹配					
经济状况	匹配前	8.796	9.069	-0.272***	0.056
	匹配后	8.860	8.858	0.002	0.063
心理状况	匹配前	2.975	2.957	0.019	0.075
	匹配后	3.005	2.850	0.155*	0.093
生活满意度	匹配前	2.647	2.498	0.149***	0.053
	匹配后	2.635	2.529	0.106*	0.056

注：①\*\*\*、\*\*和\*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水平上显著；②匹配后的标准误是采用 bootstrap 抽样得到的自助标准误，自助样本为 1000 个。

## （二）子女回流前后代际支持的变化对父母生活质量的影响

为了进一步探讨子女回流前后代际支持的变化对父母生活质量的影响，将经济支持、生活照料、情感慰藉作为主要解释变量，父母的经济状况、心理状况、生活满意度作为被解释变量，父母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等特征作为控制变量，分别运用 OLS 和有序 Probit 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由于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生活照料、情感慰藉三者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同时放入模型中可能造成严重的多重共线性，因此，在回归之前，本文先对相关变量进行了多重共线性检验，排除了存在高度共线性的可能。回归分析过程中，先将经济支持变量作为主要解释变量，再将生活照料变量和情感慰藉变量纳入回归分析，估计结果见表 6。

1. 父母经济状况的影响因素分析。方程 1a 表明，子女回流后提供的经济支持变化未能显著改善父母的经济状况。方程 1b 在加入生活照料变量和情感慰藉变量后，经济支持变量仍不显著；生活照料变量显著且系数为正，但情感慰藉变量的回归结果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对此可能的解释是，子女回流后对父母生活照料（如帮助购物、做家务等）的增加可能会节约父母的时间和精力，从而增加其从事经济活动的劳动时间投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父母的经济状况。从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来看，父母的年龄对其目前经济状况的影响显著且系数为负，年龄越大，经济状况越紧张。同时，患有慢性疾病对父母目前的经济状况也有着显著的不利影响，即患有慢性疾病的父母经济状况较差。这主要是因为，一般情况下，患有慢性疾病的老人劳动能力会下降，劳动参与减少，打零工或干农活的收入都会减少甚至丧失。此外，有配偶的、受教育程度较高的或从事非农工作的父母，经济状况相对较好。

2. 父母心理状况的影响因素分析。方程 2a 的回归结果显示，经济支持变量显著且系数为正。方程 2b 加入生活照料变量和情感慰藉变量后，经济支持变量仍然显著且系数为正，而且情感慰藉变量显著且系数为正，表明子女回流后提供的经济支持变化和情感慰藉变化能够显著改善父母的心理状况。对此可能的解释是，一方面，子女在经济方面提供的支持有利于降低父母的日常生活压力，间接地促进父母的身心健康；另一方面，沟通交流的增多能够使代际关系变得更加密切，从而有效缓解父母的孤寂感，直接改善父母的心理状况。但从方程 2b 中经济支持和情感慰藉变量的 p 值分别为 0.063 和 0.051，以及经济支持变量的显著性较方程 2a 有所降低来看，情感慰藉对父母心理状况的改善作用更加明显，说明子女回流后给予父母的精神慰藉能够更加显著地改善父母的心理状况。此外，有配偶对缓解父母的孤寂感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说明有配偶的父母相较于没有配偶的父母，其心理状况更好。生活自理程度越高的父母，相对而言心理状况越好。独居（或与老伴居住）对父母的心理状况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说明与子女（或孙子女）共同居住的父母的心理状况好于独居（或与老伴居住）的父母。

3. 父母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分析。方程 3a 的回归结果显示，经济支持变量显著且系数为正，且在 1%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表明回流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变化能够显著提高父母的生活满意度。当在方程中同时加入经济支持变量、生活照料变量和情感慰藉变量后，方程 3b 的回归结果显示，经济支持变量仍显著且系数为正，而生活照料变量和情感慰藉变量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可能的原因是，即使子女回流后对父母的生活照料和情感慰藉有所增加，但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仍是影响其父母生活满意度的重要因素。此外，患有慢性疾病和生活自理程度较低对父母的生活满意度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即未患慢性疾病的父母，其生活满意度较高；生活自理程度越高的父母，其生活满意度越高。相较于独居（或与老伴居住）的父母而言，与子女（或孙子女）共同居住的父母对生活的满意程度更高。仍从事非农工作、个人及配偶年收入较低的父母，其生活满意度较低。

表 6 子女回流前后提供的代际支持变化对父母生活质量影响的回归结果

	方程 1a	方程 1b	方程 2a	方程 2b	方程 3a	方程 3b
	经济状况	经济状况	心理状况	心理状况	生活满意度	生活满意度
经济支持	-0.030 (0.045)	-0.048 (0.045)	0.152** (0.067)	0.125* (0.067)	0.327*** (0.068)	0.309*** (0.068)
生活照料	—	0.132* (0.072)	—	-0.052 (0.100)	—	0.099 (0.101)
情感慰藉	—	0.049 (0.065)	—	0.203* (0.097)	—	0.114 (0.088)
性别	0.070 (0.065)	0.074 (0.065)	-0.122 (0.096)	-0.114 (0.096)	-0.097 (0.091)	-0.108 (0.091)
年龄	-0.020*** (0.007)	-0.020*** (0.007)	0.004 (0.011)	0.007 (0.011)	0.018* (0.010)	0.020* (0.010)
婚姻状况	0.342*** (0.093)	0.330*** (0.095)	0.756*** (0.142)	0.716*** (0.142)	0.151 (0.133)	0.155 (0.133)

(续表 6)

是否患有慢性疾病	-0.232*** (0.067)	-0.227*** (0.068)	-0.125 (0.098)	-0.134 (0.099)	-0.213** (0.092)	-0.201** (0.092)
生活自理状况	-0.026 (0.085)	-0.020 (0.086)	0.297** (0.121)	0.309** (0.124)	0.299** (0.127)	0.284** (0.125)
受教育程度	0.259*** (0.085)	0.273*** (0.086)	0.163 (0.127)	0.161 (0.128)	-0.030 (0.110)	-0.014 (0.112)
是否从事非农工作	0.685*** (0.076)	0.694*** (0.077)	0.008 (0.134)	0.001 (0.134)	-0.445*** (0.122)	-0.427*** (0.123)
子女个数	-0.022 (0.030)	-0.027 (0.030)	-0.010 (0.043)	-0.025 (0.044)	0.014 (0.045)	0.007 (0.045)
居住安排	0.125 (0.093)	0.135 (0.095)	-0.422*** (0.138)	-0.402*** (0.137)	-0.291** (0.122)	-0.273** (0.123)
父母年收入(对数)	— —	— —	0.060 (0.060)	0.062 (0.060)	0.238*** (0.061)	0.228*** (0.062)
河南省	-0.380*** (0.082)	-0.381*** (0.082)	-0.130 (0.130)	-0.131 (0.130)	-0.101 (0.134)	-0.098 (0.135)
四川省	-0.005 (0.087)	-0.015 (0.087)	0.275** (0.127)	0.284** (0.128)	-0.250** (0.125)	-0.247* (0.126)
常数项	10.026*** (0.529)	9.710*** (0.566)	— —	— —	— —	— —
R <sup>2</sup>	0.299	0.306	—	—	—	—
Pseudo R <sup>2</sup>	—	—	0.042	0.044	0.048	0.050

注：① \*\*\*、\*\*、\*分别代表在 1%、5%、10%的水平上显著；②括号中为标准误；③观测值个数为 603。

## 五、主要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安徽、河南、四川 3 省的实地调研数据，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OLS、有序 Probit 模型，从经济状况、心理状况、生活满意度 3 个方面检验了农民工回流对其父母生活质量的影响，得到如下结论：

第一，农民工回流对父母的经济状况无明显影响，但显著改善了父母的心理状况和对目前生活状况的满意程度。这说明，子女回流并没有显著改善父母的经济保障水平，但填补了父母的精神空缺，使父母的精神需求得到一定满足，并且对目前生活状况的满意程度有所提高。可能的原因是，相较于在外务工而言，子女回流后给父母提供的经济支持的变动幅度并不大，从而父母的经济状况未明显受益于子女回流。然而，子女回流后，与父母之间的交流联系不再受到空间距离的阻碍，情感互动增加，弥补了父母精神层面的需求，有效排解了父母的孤独感，从而提高了他们的生活满意度。

第二，回流子女提供的代际支持对父母的生活质量有着不同程度的改善作用。具体来看，首先，

虽然子女回流后对父母的经济支持无明显变化，未能改善父母的经济状况，但回流后对父母日常生活照料增加，可能会增加父母从事经济活动的劳动时间投入，从而对父母的经济状况有轻微的改善作用；其次，回流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和情感慰藉能够显著改善父母的心理状况，说明经济支持和情感慰藉可以很好地满足父母的物质或精神需求，情感交流和关系密切比经济上的帮助对父母心理状况的改善作用更加明显，也进一步表明随着农村生活水平的提高，老人会越来越注重精神慰藉；最后，回流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对父母生活满意度的改善作用最为明显，这可能是因为不管子女回流与否，经济状况仍是影响农村老人对目前生活状况满意程度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对于高龄老人而言，身体机能的衰退、劳动能力的逐渐丧失使他们缺乏稳定的收入来源，因此，相对于日常的生活照顾和情感慰藉，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更为重要。

综上，农民工回流拉近了他们与父母的空间距离，使农村老人获得了更多代际支持，继而改善了生活质量。该研究结论可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以下参考：第一，继续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一方面通过经济结构调整、产业转型升级、小城镇建设为本地农民工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另一方面通过完善就业促进措施，为回流农民工提供有效的就业信息和就业渠道，为农民工返乡创业提供各方面的支持，吸引更多农民工就近就地就业创业。第二，注重和加强对农村老人的精神关爱，一方面通过建立健全农村老年人活动中心等公共文化体育设施、鼓励老年协会等社会组织发展等措施，优化农村老人的精神文化生活环境，另一方面通过媒体等多种途径加强传统孝道文化的宣传和教育，积极倡导子女不管是外出还是回流都要履行对父母的赡养义务，在保证经济支持的同时，以各种通讯手段加强与父母的联系，降低父母的孤独寂寞感，提高其生活满意度。第三，加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设，逐步提高养老金的保障水平，从而增加老人的经济收入，使老人不再仅仅依赖个人劳动所得以及子女赡养来维持晚年生活，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老人身体和心理上的负担。同步发展其他保障制度，如继续完善医疗保障制度，通过减轻农村老人医疗负担，改善农村老人的生活质量，提高老人的主观幸福感。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第一，由于样本量的限制，本文没有针对老年群体的异质性根据样本的年龄段、生活自理程度等区分样本进行回归分析。第二，本文主要是基于安徽、河南、四川3省的调查数据进行分析，这3个省均是农民工回流规模较大的省份，但对于那些回流规模较小的省份，情况可能有所不同。因此，今后若能扩大调查的覆盖区域，并基于更大规模的全国性数据开展实证研究，将会进一步提升研究结果的可信度。

#### 参考文献

1. 安东尼·吉登斯, 1998: 《社会的构成》, 李康、李猛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
2. 白南生、何宇鹏, 2002: 《回乡, 还是外出? ——安徽四川二省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研究》, 《社会学研究》第3期。
3. 陈文超、陈雯、江立华, 2014: 《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影响因素分析》, 《中国人口科学》第2期。
4. 狄金华、魏利香、钟涨宝, 2014: 《老人居住模式与养老资源获取——对谢桂华研究的再检验》, 《北京社会科学》第5期。
5. 贺聪志、叶敬忠, 2010: 《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对留守老人生活照料的影响研究》, 《农业经济问题》第3期。

- 6.胡枫、史宇鹏, 2013:《农民工回流的选择性与非农就业:来自湖北的证据》,《人口学刊》第2期。
- 7.李建新、冯莹莹、杨鹏, 2014:《农村空巢老人生活质量研究》,《老龄科学研究》第2期。
- 8.李强、龙文进, 2009:《农民工留城与返乡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中国农村经济》第2期。
- 9.连玉君、黎文素、黄必红, 2015:《子女外出务工对父母健康和生活满意度影响研究》,《经济学(季刊)》第1期。
- 10.刘亚洲、钟甫宁、王亚楠, 2016:《新农保对中国农村老年人劳动时间供给的影响》,《人口与经济》第5期。
- 11.卢海阳、钱文荣, 2014:《子女外出务工对农村留守老人生活的影响研究》,《农业经济问题》第6期。
- 12.罗芳、彭代彦, 2007:《子女外出务工对农村“空巢”家庭养老影响的实证分析》,《中国农村经济》第6期。
- 13.舒玢玢、同钰莹, 2017:《成年子女外出务工对农村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再论“父母在,不远游”》,《人口研究》第2期。
- 14.宋月萍, 2014:《精神赡养还是经济支持:外出务工子女养老行为对农村留守老人健康影响探析》,《人口与发展》第4期。
- 15.谭崇梅、叶曦、曾志坚, 2009:《当前农民工回流的原因分析及其影响、对策研究》,《金融经济》第6期。
- 16.唐浩、施光荣, 2014:《劳动力外出务工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研究》,《中央财经大学学报》第12期。
- 17.王春超、李兆能、周家庆, 2009:《躁动中的农民流动就业——基于湖北农民工回流调查的实证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3期。
- 18.郭沧萍, 1990:《北京市人口老龄化与老年人口生活质量问题研究》,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
- 19.叶敬忠、贺聪志, 2009:《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对留守老人经济供养的影响研究》,《人口研究》第4期。
- 20.于普林, 1996:《老年人生活质量调查内容及评价标准建议(草案)》,《中华老年医学杂志》第5期。
- 21.余运江、孙斌栋、孙旭, 2014:《社会保障对农民工回流意愿有影响吗?——基于上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人口与经济》第6期。
- 22.张丽琼、朱宇、林李月, 2016:《家庭因素对农民工回流意愿的影响》,《人口与社会》第3期。
- 23.赵亮、张世伟、樊立庄, 2009:《金融危机环境下农民工回流问题分析》,《江西社会科学》第8期。
- 24.郑晓冬、方向明, 2016:《农村空巢老人主观福利:经济支持还是情感支持——基于CHARLS数据的实证研究》,《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6期。
- 25.朱红根、解春艳, 2012:《农民工返乡创业企业绩效的影响因素分析》,《中国农村经济》第4期。
- 26.左冬梅、李树茁, 2011:《基于社会性别的劳动力迁移与农村留守老人的生活福利——基于劳动力流入地和流出地的调查》,《公共管理学报》第2期。
- 27.Adhikari, R., A. Jampaklay, and A. Chamrathirong, 2011, “Impact of Children’s Migration on Health and Health Care-seeking Behavior of Elderly Left Behind”, *Bmc Public Health*, 11(1): 143.
- 28.Cong, Z., and M. Silverstein, 2011, “Intergenerational Exchange between Parents and Migrant and Nonmigrant Sons in Rural China”, *Journal of Marriage & Family*, 73(1): 93-104.
- 29.Demurger, S., and H. Xu, 2011, “Return Migrants: The Rise of New Entrepreneurs in Rural China”, *World Development*, 39(10): 1847-1861.
- 30.George, L. K., and L. B. Bearon, 1980, *Quality of Life in Older Persons: Meaning and Measurement*, New York: Human

Sciences Press.

31.He, C., and J. Ye, 2014, “Lonely Sunsets: Impacts of Rural–urban Migration on the Left-behind Elderly in Rural China”, *Population Space & Place*, 20(4): 352-369.

32.Junge, V., J. R. Diez, and L. Schätzl, 2015, “Determinants and Consequences of Internal Return Migration in Thailand and Vietnam”, *World Development*, 71: 94-106.

33.Rosenbaum, P. R., and D. B. Rubin, 1983, “The Central Role of the Propensity Score in Observational Studies for Causal Effects”, *Biometrika*, 70(1): 41-55.

34.Wang, W., and C. Fan, 2006, “Success or Failure: Selectivity and Reasons of Return Migration in Sichuan and Anhui, China”, *Environment & Planning A*, 38(5): 939-958.

35.Xiang, A. O., D. Jiang and Z. Zhao, 2016, “The Impact of Rural–urban Migration on the Health of the Left-behind Parents”,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37: 126-139.

36.Zhao Y., 2002,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Return Migration: Recent Evidence from Chin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30(2): 376-394.

(作者单位：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责任编辑：张丽娟)

## Can the Return of Migrant Workers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Their Parents?

Li Fang Zhao Jingjing

**Abstract:** The return of migrant workers shortens the spatial distance with their parents, which has effects on rural eldercare and the life of the left-behind elderly in rural areas. Based on the field survey data from Anhui, Henan and Sichuan provinces, this article uses a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method, an OLS estimation and an Ordered Probit model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the return of migrant workers on their parents' quality of lif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return of migrant workers ha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eir parents' mental status and life satisfaction, but it has not exerted prominent influence on their parents' economic status. The financial support, life care and emotional solace provided by returned migrant workers have varying degrees of improvement on the quality of life of their parents.

**Key Words:** Return of Migrant Worker; Parents; Economic Status; Mental Status; Life Satisfaction